

苏小和作品系列

1820

1911

1937

1949

百年 经济史笔记

中卷·倒退的民国

苏小和 著 刘晓光 主编

东方出版社

1820

1911

1937

1949

百年 经济史笔记

中卷·倒退的民国

苏小和 著 刘晓光 主编

東方出版社

本卷书得到了南都公益基金的特别支持

1911

—

1937

中国经济史
和企业史的双向叙事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企业家自治时代的来临

- | | |
|-----------------|-----|
| 一、黄金时代经济解释的三种路径 | 001 |
| 二、看上去模棱两可的市场格局 | 008 |
| 三、自上而下的国家主义经济政策 | 015 |
| 四、逐渐崛起的城市商业精英 | 022 |
| 五、一种混合的价值观 | 028 |
| 六、城市商业社会的自治局面 | 035 |

第二章 黄金时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秩序

- | | |
|-----------------|-----|
| 一、1919年，极其繁荣的一年 | 044 |
| 二、中国的第二次工业化运动 | 050 |
| 三、黄金时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结构 | 057 |
| 四、钱庄与自由金融秩序 | 065 |
| 五、民国内需市场旺盛的秩序 | 072 |

第三章 上海滩与企业家的秩序

- | | |
|------------------|-----|
| 一、大上海与一个时代的城市化进程 | 080 |
| 二、大上海和一个时代的企业分布 | 087 |

三、企业家的价值观转型和市场转型	096
四、《银行周报》和上海银行公会的市场自治意义	107
五、上海总商会的企业家自治范本	117

第四章 黄金时代的企业家关系

一、乡党企业家，黄金时代的市场关系	127
二、家族企业家，黄金时代的企业组织结构	149
三、黄金时代机械工业的自发秩序	161
四、黄金时代纺织业的现代企业家禀赋	179
五、天津城市与现代企业家的困境	188

第五章 中国企业民族主义的陷阱

一、现代企业被民族主义裹挟	206
二、市场经济与抵制日货	220
三、企业家政权对现代企业的影响	230

第六章 民国的倒退或新一轮官商结合体制的兴起

一、1927年是企业家的垮塌之年	244
二、企业家市场自治秩序式微的影响	251
三、企业家弃商从官的典型案例	260

四、南京政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型	265
五、失败的民国经济改革	273
六、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基本格局	279
小结：经济史和企业史双向叙事的启示 / 290	
参考文献 / 315	

第一章

中国企业家自治时代的来临

经济学家除了观察分析市场的走向，一个更加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监督政府不要干扰市场。

——布坎南

一、黄金时代经济解释的三种路径

关于黄金时代，按照白吉尔^①的分析框架，是指晚清谢幕后的1919—1937年。关于这一段历史时期中国市场经济秩序兴起的方式，一直见仁见智。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区域性的农耕经济发展到19世纪下半叶，已经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动力。马克斯·韦伯在1912年就这样说过，中国是一个君主专制、闭关自守和停滞不前的社

① 白吉尔，历史学家、法国大学名誉教授，她对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分析，代表着一种不同于中国大陆主流历史教科书分析框架的思想源流。代表作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剑桥中华民国史》的写作者之一。本课题的史料来源，主要借鉴了白吉尔的著作，因此本课题属于关于白吉尔著述的一种读书笔记。白吉尔认为黄金时代包括1919—1937年，本课题认为，真正具有市场自由经济秩序的黄金时代，应该是从1919—1927年。1927年之后则是黄金时代的退潮时期，是中国新一轮大政府主义经济政策的兴起时期。

会^①；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也直言，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已经抵达“最高限额”，如果没有制度性的变革，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将变得不再可能。这样的观点，得到了西方大多数学者的认可，在西方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

从经济史的角度看，亚当·斯密所说的最高限额时代，应该是在1400—1850年之间。这大约450年的时间，中国人口的总数从6000多万增加到了4.3亿，生产总值当然也是正比例地增长，人口大面积向南方地区迁徙，而耕地面积从3.7亿亩增加到了9.5亿亩^②。当传统农业的发展积累到一个变量之后，手工业的出现就成为必然的结果。区域性市场的交换随之出现，并且勃兴，这又反过来推动农业、金属加工业、纺织业、造纸业和陶瓷业等制造行业的发展。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集市现象在这个时候蔚为大观，这成为区域性商业经济高速发展最主要的表征。学者施坚雅认为，到晚清末年，中国经济结构中地方的集市现象达到了6.3万个，集市的增长率甚至超过了人口的增长率，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终于发展成为一个区域性的商业社

① 韦伯的《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三卷本，第一卷《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学》第一部分“儒教与道教”，集中分析了中国的社会问题，他的观点影响了大部分西方研究中国历史的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相关的文献，主要有马里恩《中国现代商业阶级的崛起：两篇导言》、卢西恩《中国政治学的精髓》、李仪渊《中国人的性格——克己综合性的讨论》等。

② 参见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16页。

会。^①

有些经济学的常识需要在这个时候提出。当商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市场的交换成为常态，人们对货币的需要就变得非常迫切。一直以来，清政府在货币政策方面都严重滞后于商业交换，通行的做法是通过增加白银进口，或者提高本国的铜产量来生产货币，这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求助于一种准私人银行，也就是钱庄。钱庄的出现，是市场化自由交换背景下民间力量自发的秩序，在山西，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宁波一带，一种民间的信贷制度变得十分火热，由于得到家族和同乡的支持，钱庄在几乎没有政府干预的制度背景下迅速发展，肩负起了一个时代市场交换的主要职能。^②

事实上，按照市场自发秩序的逻辑，政府在这个时候应该顺应市场的发展，共同将市场的容量做大。比如主动向外部世界开放，进入国际贸易秩序。但众所周知，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之内，晚清政府采取的主要经济政策是抵制西方经济秩序，拒绝更大范围的开放。这一段历史图景，国内的主流历史观解读

① 施坚雅，斯坦福大学人类学教授，1950—1951年到中国四川考察，1977年考察中国城市市场。美国亚洲学会会长，著有《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发表大量研究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科学研究、农村和农民、人口、民族、海外华人的论文。

② 参见苏珊·M·琼斯：《1750—1850年宁波的金融势力》；安德烈：《1880—1935年的上海钱庄，处在变化中社会的一个传统机构》。分析了东南沿海民间金融的发展。而山西票号的出现，事实上比宁波、上海的钱庄要早，但山西票号普遍建立在官僚特权的基础上，主要收集国家官款和官僚的私人款项，并没有外来资本，因此不具有对外资本自由流通的意义。这是山西票号和东南沿海钱庄的区别所在。

为西方列强通过鸦片战争，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将中国拖入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国外的历史学界则认为，正是由于一系列条约口岸的产生，中国进入了一个被动开放的时代。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虽然极不情愿，但不得不被更大范围的工业化和国际贸易秩序推着走，这种被动地开放和发展的历史态势，才是历史的主流，任何一种力量都不可能阻止，即使一些历史时期出现了明显的倒退，但从大势来看，中国市场的开放，融进世界经济秩序，才是真正的大势。^①

另外一种历史观点，与第一种观点几乎是尖锐对立的。这就是中国国内一大批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为学术基础的历史观，他们认为，中国更加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之所以流产，主要是19世纪帝国主义的侵略阻断了市场的发展。这是占据国内所有历史教科书的观点，它的影响力在于，由于强化了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利益冲突，使得大多数中国人转向一种更加决绝的自力更生精神，即中国人可以在不接受世界经济秩序的前提下，实现自我范围之内的发展。^②

事实上，这种分析框架的漏洞很明显。第一，整个世界市场经济的大幅度演进，取决于工业革命意义上的新技术的支持，如果假定1820年条约口岸经济产生之前的中国经济可以衍生出足够丰富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则必须证明，中国在此之前已经走上了工业革命的道路，技术的发生和发展已经足以支撑

① 参见郝延平：《中国近代商业革命》，结论篇。

② 这是范文澜先生的主要观点。

中国人大踏步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第二，事实上，整个晚清时代、民国时代，以及更加丰富的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社会和中国市场最大的主题是对西方技术的引进、学习和模仿。也就是说，正是1820年以来条约口岸经济的展开，带来了工业技术的革新，而技术的革新，真正推动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任何一种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解释路径，都不能回避技术因素，因为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地区，如果没有新技术的展开，几乎就不会有市场的拓展，更不会产生近现代工业秩序，不能产生具有产权意义、技术创新和自由竞争意义的现代企业家。

第三种对中国市场经济的解释框架，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秩序。事实上，沿着儒家伦理维度分析中国市场经济的发生和发展，争议更大。所谓矫枉过正，当儒家伦理支撑中国经济的发展长达千年却没有将中国经济导入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秩序，人们有理由也有情绪将所有的错误归咎于儒家精神，并大声指出，正是儒家的内在价值观才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障碍。比如儒家伦理观念尊重等级制度，所谓士农工商，这里既有对官僚士绅的抬高，也有对从事商业市场人士的歧视。官僚阶层由此构成了一种无可非议的、绝对专制的政权，这种政权体制不仅在思想的层面主导社会，而且在市场的层面主导经济秩序，正是后者，使得中国社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为各种形式的私人企业提供自由竞争的空间，大量的商人和生意都依附于官僚体制，一个古老帝国的政府框架从根本上束缚了资本

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①

这种解释框架，放在更加开放的全球化时代，可能有一些合理的成分，但放在以农耕经济和手工业经济为主导的前工业时代，说服力就显得不足。按照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逻辑关系，人们必然能够看到，儒家伦理除了给中国社会提供一种社会秩序之外，无疑也给市场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道德自律的秩序。事实上，儒家传统价值观对产权的尊重，对官僚集团的道德制约，的确有着丰富的价值观资源。当这种价值观成为政府的主流，以晚清政府对盐业的垄断为例，人们看到政府有些时候采取了灵活而且有效的市场性方法。如适当放松监管和市场化的盐商联盟，适时推出休养生息措施，减税或者由政府主导兴修水利设施等。^② 这些措施显然有利于私人经济的发展。这可能是儒家伦理支撑之下的市场秩序最理想的图景。

明清两代，耕田的私有化秩序一直比较健全，这种秩序事实上一直延续到了民国，相应的，地租也随之契约化，整个国家的土地市场是可以自由交换的。^③ 市场的力量在这里成为主要动因，虽然官方的意识形态和朝廷的官僚并不支持这样的市

① 这是著名的中国学家墨子刻的观点。墨子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主要著作有《清朝官僚体系的内在组织：合法的、标准化的、沟通的因素》《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等。其中，《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一书涉及从宋明理学、清代官僚制度一直到当代毛泽东、新儒学以及社会科学家们的思想，从“政治文化”角度揭示了宋代以后新儒学的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深刻联系，在美国汉学界中可谓是一大突破。

② 除了墨子刻对此有分析，学者伊德的著作《清朝国家在商业领域中的组织能力》，比较详细地呈现了清朝官僚与私营企业家实现有效合作的大量史料。见《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

③ 参见墨子刻：《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根源》。

场秩序，但一直没有成为这种秩序的拦阻力量。可以肯定地下结论，儒家伦理支持下的农耕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在明清两代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辉煌的水平。只是当这样的经济形态面临着工业革命的新技术秩序，才显得力有不逮。

或许人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古典的儒家伦理精神和大一统的朝廷式政府管理方式，配合传统的农耕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对市场和资本的推动已经抵达顶点。亚当·斯密的“最高限额”，马克思·韦伯对中国制度的批评，对传统道德文化的批评，其意义就在这里。这在市场的逻辑维度上，是可以解释的。因为人们不难发现，晚清垮塌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没有实现有效的市场容量的积累和有效的资本积累，也没有有效的企业家精神积累，更没有形成一种自发的技术革新，相反，对外来技术的引进与运用，都被人为控制在抵御外来技术的层面，而与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基本无涉。这成为中华民国的经济展开之前最主要的图景。

是的，中国市场的对外贸易在加强，以集市为基础的区域性贸易也在加强，民间信贷市场一直顽强生长，资本的流通速度不仅在国内有加快的趋势，在国际上也大面积扩展。但由于企业家阶层的建设受到了官僚集团的大面积压制，整个市场缺乏推动力，无法将经济纳入自由竞争和利润法则的市场化轨道。^①

^① 参见陈锦江著，王笛、张箭译，虞和平校：《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5页。

或者干脆这样说，正是由于市场的场域不够开阔，自由竞争的程度不够深入，民国经济发展只能立足于非常浅层次的市场基础。大量的农产品没有商品化，只有大约 1/3 的农产品进入流通渠道，而且其辐射范围仅仅限制在方圆 10 公里内的消费需求。^① 国家的对外贸易形势，基本限定在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一带，远远没有形成对整个内需市场的拉动能力。

那些散落在各地的小集市，仅仅对当地的简单消费品有一个更加简单的交换作用，并没有将生产和大面积的销售卷入市场中，因此这样的集市现象无法形成一种更大范围的整合，人们找不到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虽然人口基数庞大，但贸易的展开却一直是区域性质。^② 在这个时候，整个中国基本上还处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耕文化时代，而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由国民党独裁管制的更加激进的中华民国，以一种新国体形象，已经站在所有中国人的门口。

二、看上去模棱两可的市场格局

学者西蒙·库兹涅茨的研究呈现了一个基本的经济史现象：

① 参见帕金斯：《1368—1968 年中国农业的发展》。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农村，农产品大约有 20%～30% 在当地作为商品得以交换，10% 会被运到外地出售，3% 出口。总体而言，农产品的市场交换半径比较狭窄，这与市场的过度区域化，人口的流动性不够有关。

② 参见施坚雅：《城市与地方系统中的等级结构》，见《晚清时期的城市》。

市场经济既不是市场大量增加的结果，也不在于其整体化的程度，而是将工业新技术引入一个极其商品化的社会里，“将科学技术普遍地应用于市场经济生产和交换的所有问题之中。”^①

沿着西蒙·库兹涅茨的思考路径阅读中华民国之前的中国市场经济趋势，有几个命题就会浮出水面。第一，可能是新技术的缺失拖后了中国传统的农耕经济向资本主义的转型。第二，可能是政府的管理方式拖后了技术的自发创新与外部引进。这是一个发展的悖论，一方面，农耕经济背景下的商业发展已经积累到了一个变量，另一方面，技术的停滞和政府管理方式的陈旧，又与自由交换的商业经济秩序构成一种紧张的关系。学者米歇尔·莫瑞诺将这种经济史的局面定义为“发展的模棱两可状态”。这个定义后来成为经济史学界分析诸多后发国家市场经济态势的关键词。^②

事实可能正是这样。由于中国社会在长达几百年的农耕经济秩序下几乎没有发生具有创新意义的新技术革命，因此，由农耕经济和与之相关的手工业经济堆积起来的经济繁荣，事实上只是一种简单的生产量的扩展。它可能是一个国家经济腾飞和工业革命的必要性前奏，但并不是经济腾飞和工业革命本身。事实上如果没有新技术的介入，如果政府的制度设计不支持新技术的开放与流动，那么这种立足于传统经济的繁荣模式，就

① 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的发展、速度、结构和范围》，耶鲁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9页。

② 参见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白吉尔认为，这个关键词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明确的经济史学分析概念。

会导致一些意外的结果，比如中等收入的陷阱导致的整体经济的衰落及崩盘。

这样的经济史陈述，能够让人们很好地理解中国经济在进入 19 世纪之后的景象。是的，这一段经济史的基本轨迹，首先是本土农耕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的衰落，其次才是国际贸易秩序之下中国近代企业和企业家的兴起。严重的在于，国家的开放、新技术的参与、近代企业和企业家的兴起，一直是一种被动的状态。冲突是非常明显的，最本质性的冲突是传统经济与新技术的市场经济的冲突。固守传统农耕经济的模式已经不可能，但却又本能地抵制和排斥新技术。人们的生活方式遇到了极大的挑战，经济链条被暂时割裂，新的经济发生方式却又不受欢迎，这迅速演化成了一种社会的断裂。内有方兴未艾的农民暴动，外有不断升级的贸易纠纷，整个国家陷入腹背受敌的局面中，3000 年未有之变局，同样地，这也是 3000 年未有之危机。

社会的分化几乎以几何级数的方式在裂变。商业的快速交换再也不会停顿下来，传统的政府管理方式却又尾大不掉。那么，社会结构的层次就会出现新景象。传统的士农工商结构，已经不能说明新的社会结构形式，一个重要的变量，是无论城镇还是乡村，都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便是商人地位的不断攀升，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大面积向市场和商业转移。随着小私有企业主、佃农和商人社会地位的不断攀升，随着人口流动性的不断加速，传统的士绅阶层也开始走出传统的道德权力秩序，将公共职务、财富和地方名望结合起来，掌控